

气候慈善专栏

防灾减灾救灾新趋势：从气候适应入手，建设韧性城乡社区

■ 本报记者 王勇

当前，我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面临不少新情况新问题。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天气和暴雨、洪涝、台风、干旱等灾害显著增多，破坏性加剧，且时空分布出现新变化。8月26日，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发生泥石流灾害，就是由尼泊尔境内高位冰川崩塌引发。

习近平总书记在二十届中央政治局第二十五次集体学习上强调，要推动灾害治理向事前预防转型；提升大灾巨灾应对处置能力；强化科技支撑和法治保障；夯实防灾减灾救灾基层基础；认真抓好责任落实。

面对新的变化新的要求，作为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包括社会组织、企业、个人等在内的社会力量应该如何应对？气候意识、气候适应、韧性建设等将成为关键词。

政策：主动适应气候变化

中国气象局气候变化中心发布的《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6)》显示，极端高温事件自21世纪以来明显增多；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全国累计暴雨站日数每10年增加4.5%。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反映出我国气候风险呈现新特点，也对防灾减灾提出了更高要求。

6月8日，《现代化应急体系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要求突出风险源头管控，加快治理模式向事前预防转型。具体包括健全源头管控机制、加强监测预报预警、提升本质安全水平、打造安全韧性城乡等要求。

7月3日，《美丽中国建设“十五五”规划》印发，要求主动适应气候变化。完善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推动建设气候适应型社会……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能力，强化综合防灾减灾。

7月27日，《国家应对气候变化“十五五”规划》印发，提出“适应气候变化工作体系更加完善，气候适应型社会建设取得阶段性进展，应对气候变化意识和能力持续增强”的2030目标。

从气候适应的视角出发，建设韧性城乡，做好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已经成为政策的关键点。如何理解这一点？可以从重庆市“两岸四江”生态修复与气候适应性改造示范项目中略窥一斑。

2026年6月，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振华基金气候行动地方能力建设项目实地调研了其中的重要点位——江北嘴江滩公园。受气候影响，重庆两江会出现季节性水位涨跌。因此，在对公园滨江岸线进行改造时，当地因地制宜打造了标高分别为165m、178m、190m的三级分层滨江步道，同时在175米水位以下选择了狗牙根、卡开芦、白茅等适合消落区栽种的植物，保证洪水后迅速复绿，从而兼顾了高低水位通行与亲水游玩需求，同时还让市民在打卡游玩过程中受到了润物无声的防灾减灾教育。

“江北嘴江滩公园的建设，是城市滨水空间从‘被动防洪’转向‘主动气候适应’的生动样本。这种‘与水共生’而非‘与水对抗’的规划理念，正是气候适应型城市建设的核心要义。”中华环境保护基金会副秘书长王振刚强调。

探索：新的趋势开始出现

企业是防灾减灾救灾工作的重要力量。每当大灾来临，第一时间通过大额捐赠支持救灾工作已经成为惯例。但在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的背景下，企业有了更多捐赠资金和物资之外的思考与探索。

腾讯公益推出了应急超市，面向受灾家庭发放爱心消费券（电子券、纸质券），让村民根据自身实际需要，前往应急超市或定点合作商户兑换物资，而不是被动接受统一分发的物品包。对灾民来说，获得的不是临时救助物资，而是安居重建的助力；对当地商家来说，有了更快恢复正常运营的机会。综合来看，实际上激活了受灾地区的内生动力，让当地具备了更强的应对气候变化的韧性。

美团医药健康通过星驰行动，逐步构建起覆盖“防灾减灾——应急救灾——灾后过渡”全链条的应急响应能力。防灾减灾阶段，将数字

商业生态日常商业能力转化为“平急两用”的社会应急储备（包括物资和人员）；灾害发生后，依托前期储备基础，联动全生态资源，围绕资金与物资捐赠、激活运力网络与末端配送、灾情信息传播与安置保障、线上问诊与心理疏导开展工作；灾后过渡阶段聚焦受灾群众与商家的双向复苏。

“平急两用”机制的形成，推动应急响应从“救急”走向“回归常态”，让企业成为韧性社会建设的参与者和支持者，不断增强应对极端气候的韧性。

平安产险针对重大自然灾害打造了“灾前-灾中-灾后”全流程风险减量体系。灾前防御，依托鹰眼平台大数据和风险模型，实现隐患早识别、早预警、早干预；灾中救援，打造极速抢险服务链条，建设应急物资仓，做到快响应、快调度、快处置；灾后理赔，依托理赔绿色通道，推进快定损、快赔付、快复产。

以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为例，依托这套体系，向53.4万农户发布超664.6万次灾害预警及防灾指引，并协助高风险农户对大棚加固，累计抢救超8.8万亩水稻。

此外，平安产险还持续探索风险减量与公益融合的新路径。组建平安志愿者应急救援队，系统开展风险排查、应急演练、风险教育和保险保障等多项服务，广泛动员社会力量参与防灾减灾；联合中国灾害防御协会先后发布《城市重点消防安全与火灾防控指引》《地震知识与防震避险科普指南》系列科普丛书，发布国内首个韧性城市相关报告《中国韧性城市评估报告(2025)》；持续开展2026平安守护者行动——“韧性城市&安心园区”风险减量公益项目，依托科技力量赋能企业安全生产，助力提升城市防灾韧性。

实际上，目前包括平安产险在内的保险行业，都在积极推进事后理赔向事前预防、事中服务模式转型。在风险日益显著的当下，利用科技能力，积极开展风险减量工作，助力提升社会韧性，减少人民生产及生活损失，保障生命安全，对于保险公司而言是商业价值和社会价值的双向奔赴。



壹基金灾后儿童服务站开展防洪训练营活动

行动：社会组织多维发展

极端天气气候事件多发频发，让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从应急处置变为日常适应，政府的政策要求在变，企业的参与诉求在变。对社会组织而言，能否回应这些变化，推出合适的项目以满足各方需求，成为十分迫切的任务。

提高包括社会组织在内的社会各界对气候因素与自然灾害之间关系的认知首当其冲。

2021年，基于河南“7·20”特大暴雨灾害，老牛基金会与壹基金共同发起“气候变化背景下自然灾害应对策略研究与实践”项目。“我们希望从气候变化的视角，对本次暴雨灾害的气候成因进行解析，以提升公众对气候变化与自然灾害的认知，从更广的范围、更开阔的视野来探讨如何进一步加强和完善防灾减灾工作。”老牛基金会项目总监兼品牌经理杨雨春表示。

项目通过研究，回顾了河南特大暴雨灾害中社会力量应对过程及其创新举措，梳理了国际社会组织适应气候变化参与灾害风险治理的有效经验，总结了气候变化下社会力量有效参与灾害响应与韧性建设路径；与“红十字系统”、壹基金建立合作，实施“老牛生命学堂·安全家园”项目，联动了河南本地97家社会组织，设立318个社区服务站点，通过“建队伍、配物资、办培训、订预案、做演练”等活动有效提升了社区安全韧性能力。同时，结合考核认

证，赋能社会组织管理者、救援队教官、学员，从而提升了社区及社会组织防灾减灾救灾专业能力。

为了动员更多主体关注气候适应问题，2023年，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广东省千禾社区公益基金会、北京市银杏公益基金会和北京自然之友基金会联合发起“应对气候变化创新行动”（以下简称“创新行动”）资助计划。

创新行动项目选择了8个伙伴机构开展气候适应行动项目。其中“危机之星气候行动社群——气象灾害的监测预警与行动决策”项目在创新行动的支持下，构建了预先行动社群，累计汇聚441名成员，收纳300余篇专题资料，开展12场培训讲座，社群志愿者实际参与多起灾害的水雨情监测与灾情分析工作，推动志愿者从辅助执行者转向行动主体，为民间力量开展气象灾害预先应对积累了宝贵实践经验。

“我们期望通过资助培育社会化水雨情监测行动者社群，搭建专业知识库，开展能力建设与实战演练，推动灾害应对关口前移，补充现有救灾体系在基层预警、预先行动方面的短板，孵化可协作的民间气候灾害响应志愿力量。”北京绿色阳光环保公益基金会贾如婴表示。

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社会组织开始将气候适应的视角融入到防灾减灾救灾工作中，积极推动韧性城乡社区建设。

中国乡村发展基金会在河南洪灾后，于鹤壁市淇县灵山街道大石岩村创新建设韧性家园试点，从村

落风险识别、空间安全规划、安全及应急基础设施建设、安全文化建设、产业发展支持五个方面，提升村庄在面临灾害风险时的应对能力和恢复能力。

壹基金在广西救灾一月后，启动灾后韧性重建。结合当地党委政府灾后恢复规划和社区实际需求，联合社会组织伙伴，开展包括“儿童平安”“安全家园”等防灾减灾项目，以及“壹乐园”“少年足球”等儿童关怀和发展项目，助力学校和社区恢复重建，持续提升当地应对灾害的能力和恢复能力。

“灾害不是一个议题，而是一种状态。”基金会救灾协调会负责人佟欣然在日前举行的应急慈善沙龙上表示，随着灾害进入过渡安置与灾后重建阶段，受灾群体的需求会从“生存”延伸到“生活”；老人需要持续的照护服务，儿童需要心理陪伴与安全感重建，社区需要社会关系的修复。对这些长期、深度的支持维度，原本就深耕这些领域的专业机构可以补充和延伸。

水灾之外，旱灾、雪灾等灾害的应对同样受到社会组织的关注。乐施会(香港)北京办事处实施了气候变化适应与社区可持续发展实践项目，在草原牧区支持构建了“鲜草工厂+牧草银行”的协作模式。鲜草工厂依托智能化无土栽培技术，受季节和天气影响较小，可全年稳定生产优质饲草。牧草银行实行“40%保底储备+60%周转运营”机制，其中60%的饲草参与市场化周转，提高利用效率；同时引入“草票”兑换与低息借贷服务，在灾年以低于市场价10%-20%的价格向牧民供应饲草。

“适应不是宏大的工程宣言，而是落在一草一木、一砖一石的具体设计里——社会组织做社区防灾，需要从居民日常空间出发，把韧性嵌入生活场景。”王振刚强调。

在政府、企业、社会组织等各方力量的共同努力下，“提升应对气候变化特别是极端天气能力，强化综合防灾减灾”正在从规划逐步变为现实。期待更多慈善家、企业、社会组织的资金进入气候慈善领域，从气候出发，实施各类慈善项目，真正建设一个气候适应型社会，造福人类，也造福地球。

寻找慈善传统

兴仁善堂：晚清江南市镇慈善的跨省实践(下)

■ 周嘉豪

资源整合：行业捐赠与经费保障

兴仁善堂的持续运作离不开稳定的经费支持。同治十三年(1874)，善堂开始试办，但资金压力日益凸显。据档案记载，仅从同治十二年冬到十三年春的短短数月间，善堂就完成了掩埋290余具遗骸、监督5处葬礼等善举，垫付经费已超过两百千文。面对庞大的善后需求，善堂负责人杨恒、吴兆基等士绅深感力有未逮，指出该镇在经历残破之后，民众并不富裕，市集规模也很小，不及新塍镇的三分之一。

为解决经费困局，善堂采取了系统性的筹款策略。首先，他们瞄准本地四大支柱产业：丝绸业每两绸厘捐一文，按年销八九万匹估算，可得四五百千文；丝绸包商每包捐洋一元，年入约二百千文；米行每石抽捐四文；饼店每张饼捐二文。后两项合计可得数千十文。这种募捐方式，既考虑了各行业的承受能力，又确保了善款的可持续性。为确保募捐顺利，善堂还恳请官府出面，饬令各业首事，劝谕商民踊跃捐输，并建立严格的收支账册制度。光绪二十一年(1895)，王江泾兴仁善堂的收入来源主要分为上海保息款、各行业的厘金与善士的捐助、房租、绸业公所的贴膳与贴工等。

兴仁善堂的持久运作得益于

一套稳定高效的“官为支持、商为捐输”的筹资机制。善堂通过恳请官府发布告示，确立了捐输的强制性，并与建立了严格的征信录制度。这种安排使得原本属于民间自愿性质的捐赠，获得了一种半强制性的行业税收特征。这种筹资模式不仅体现了江南市镇慈善组织“取之于商、用之于民”的运营智慧，更展现了晚清地方社会在资源整合方面的制度创新能力。

规范订立：善堂章程与政府规制

嘉兴王江泾镇方面注重规范性文件的起草颁布，从而对边界治理风险进行把控，一是制定《兴仁善堂章程》，二是进一步在章程的基础上制定一系列规范性文件，以严刑峻法的方式严肃处置扰乱丧葬的行为，对不法之徒起到震慑作用。

首先是善堂章程的订立。王江泾镇士绅结合本地实情与盛泽善堂成法，拟定兴仁善堂章程共计十条，作为善堂运营与边界慈善治理的基本依据。该章程言简意赅，但内容丰富，对王江泾镇护葬、代葬、掩埋、抬骨、路毙浮尸、阻葬情事、经理与董事、清理义冢、善堂命名与选址乃至跨省事务的处理都予以关注。具体而言，其一是构建了护葬、代葬、掩埋三位一体的丧葬保障、极贫家庭免费救济、无主棺骸

与路毙浮尸规范化处理。其二是通过明确分工，界定善堂、董事、堂友、地保、汛地官等各方主体职责，规定了具体操作流程，如提前报备、现场核验、编号登记等，划定善堂与民众的费用承担边界。其三，形成了体系化的丧葬治理制度，通过全流程覆盖、多主体协同与长效化推进，加大对边界葬礼安保、无主尸体处置等问题的治理力度。其四，建立了规范合理的堂务运营体系，实行经理、董事义务任职与专职司事驻堂经办的人员架构，财务收支全数刊刻征信录公示。其五，紧扣焦点治安问题制定专属规则，明确了善堂处理毗邻吴江圩区事务时与盛泽镇种善堂联合办公的原则。

就善堂建立后规范性文件的订立而言，秀水知县发布了两则重要告示。其一是《为查案示禁事》。它指出，如有不法之徒仍敢借机阻挠葬礼，企图讹诈，允许办葬的家族会同善堂董事将他们扭送到县里，县府将依法严惩，绝不姑息。其二是《为随厂示禁事》，它旨在规范验尸过程中涉及的费用支出及相关人员行为，以防止额外索取财物和扰民现象的发生。公告明确列出了验尸过程中各类人员的饭食及劳务费用，并包括必要的物资开销，以及书差人员的船资等开支。所有费用均由王江泾兴仁善堂绅董按照既定规章支付，并随同联单送交县衙，在官府监督下当堂发

放。公告严格规定，相关人员不得额外向尸亲、被告、地主或邻里索取费用，也不得擅自传唤邻里或地保，以免造成不必要的困扰。官府强调，若有违规行为，受害者或兴仁善堂绅董可直接举报，县衙将依法严惩，不予宽贷。此公告的发布体现了地方政府对验尸程序的规范管理，确保其在合法的框架内进行。这些制度设计兼具规范性与可操作性，保障了善堂的有序运转，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防范犯罪滋生的作用，维系了地方社会秩序。

善堂建立的后续影响

王江泾兴仁善堂办理助葬善举并不局限于兴修初期，而是一个不断持续的过程，并且带来一系列后续影响。从光绪五年(1879)起，秀水县主官批准了王江泾兴仁善堂取董的建议，即按照江苏余善士的方法改用木匣掩埋骨殖，改变了通常使用骨坛的做法，同时要求他们选用干燥清洁的木材，避免引起无端的议论，这体现了来自邻省的薄葬之风正开始逐步为王江泾镇当地接受。

兴仁善堂的创设一定程度上还带动了王江泾镇士绅行善的热情。光绪二十一年(1895)闰五月，秀水籍官员王希曾连同其他本地社会名流上书秀水知县，恳请捐出名下荒田作为义冢，约定每年春冬

两季联合兴仁善堂集中掩埋朽骨，并请求官府改户豁免钱粮，以解决尸骨暴露与坏保赔累的双重问题。总的来看，兴仁善堂的修建对整个时期王江泾镇的慈善事业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带动作用。清道光年间，有记载的慈善机构只有一所义庄。在其兴起的当年(1872)，里绅吴兆基、杨恒、唐员、沈文钧等在兴仁善堂的基础上增设了育婴堂，有楼层三楹。清光绪中期，沈景修等接董堂务，捐田户充经费。光绪六年(1880)，里人唐佩金捐资，“设塾溪南”。光绪十八年(1892)，里人杨象济、杨象泰、杨应钰、杨文江各捐资产，把杨家私产德辉堂、乐山堂合成一座，在闸川镇一里街东创办“杨氏义庄”。

兴仁善堂的创设不仅推动了地方慈善事业发展，更成为市镇公共空间的重要载体，进一步产生了促进现代国家观念普及的效应。县城与市镇的“公地”，如善堂、祠堂、茶馆、各类局所、宗教场所和村镇广场等，成为地方公共活动的重要发生地，而兴仁善堂便是王江泾镇极具代表性的公共空间之一，它凭借其在地方的公信力与公共空间属性，在清末已超越单纯的慈善功能，成为民众开展公共议事、凝聚集体共识的重要场域。

可以说，同光时期王江泾镇慈善治理的新格局是外部压力反馈传导的结果，体现了边界效应。在同光

年间江南地区乡镇善堂网格化发展、义葬检验方兴未艾的大背景下，盛泽镇的助葬类善举的经验得以传播到王江泾镇，两镇善堂确立了由绅董共同会办跨区域突发事件的原则。这些做法强化了环境复杂的边界地区治理效能，从某种意义上改善了行政体系面对跨境治理时的“每患艱长莫及”。地理区位是边界效应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盛泽地处苏州府吴江县南部，与王江泾镇毗邻相望、水陆往来便利，二者同属苏嘉湖蚕桑丝织业市镇群落，产业结构、民风民俗高度相近。同时，盛泽镇作为江南重要的丝绸贸易中心，绅商群体的跨域流动十分频繁，故形成广泛且紧密的善举联系与社会关系网络。虽在府级行政区层面，太平天国战乱对嘉兴、苏州的外生冲击具有相似性，嘉兴损失略大于苏州；但就微观的市镇层面来看，浙北王江泾镇所受的冲击远大于苏南的盛泽镇，王江泾丝绸失去了品牌对地方经济的溢出效应，两地丝绸业发展出现反转。这种发展程度的差异，导致了两地人力和社会资本的水平差异，进而决定了公共物品供需的方向，塑造了两地晚清慈善事业的“榜样”与“追随者”的身份差异，进而造就了省际边界协作的具体形态。

(转自《公益研究》2026年第2期，有删减，原标题为《晚清江南市镇慈善的跨省实践——基于王江泾镇兴仁善堂的个案考察》)